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辑

合肥文史资料

HEFEI WENSHI ZILIAO

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肥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辑

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责任编辑：戴 健

助理编辑：王永秀

合肥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辑

编辑出版：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照排印刷：合肥名鼎印务公司

规格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240 千字

书号：皖内（2005）—78

定价：25.00 元

牢记历史 不忘过去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目 录

抗日爱国人士及纪念地图片

勿忘国耻,安徽各地沦陷图片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	张劲夫(1)
叶挺在芜湖、吴山的传奇经历	戴 健(40)
高敬亭罹难褚老圩及沉冤昭雪的前前后后	田 仁(46)
洗雪沉冤,含笑九泉	
——忆敬亭同志	史玉清(54)
毁家纾难抗日救国的褚峻斋	邵巽一(65)
我自青龙厂参加革命的回忆	林 佑(68)
深切怀念龚意农同志	林 恒(80)
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奔向革命	龚 纬(83)
抗日战争时期的郑抱真	孙明开(94)
赤胆忠心董完白	周行德(104)
坚持在合肥北部的抗日斗争	郑 锐(110)
日本侵略军在合肥的暴行罄竹难书	范先荣 储祥林(115)
合肥人民团结御侮奋起抗日	储祥林 范先荣(125)
三河沦陷前后	陈锡银(140)
三河军民的抗日斗争	王达然(144)
抗战中的卫立煌将军	闻 始(148)
我代表卫立煌和高敬亭谈判的经过	刘刚夫(153)
“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	
——怀念我的父亲蔡炳炎	蔡浙生(164)

沦陷期间的合肥城

- 来自侵略方的图文照片 戴 健(172)
- 我所经历的合肥沦陷 周海平(185)
- 逃难路上 董光升(189)
- 梁园守备战 蒋同明(192)
- 四百英魂壮山河 胡海涛 丰贤胜(194)
- 尸骨累累的下塘集“万人坑” 常新会(200)
- 流亡湘西的苦难岁月
- 抗战时期国立八中始末 纪良发(202)
- 八千里路云和月
- 六十年前中学生流亡生活记 阙家葵(208)
- 三位乡贤的烽火流亡路 田 聿(229)
- 抗战中贵阳大轰炸追忆 陈 衡(237)
- 炮火连天中秋节
- 一九三八年回想片段 程如峰(241)
- 附录:合肥抗日斗争大事记 吴松保(248)
- 新发现的新四军史料 (259)
- 新四军布告 新四军军政治部命令 华中敌产管理委员会
接管敌伪汉奸财产暂行办法 华中财经委员会致各行署关
于处理华中各新解放大小城市工商业与货币金融之指示
- 补白:抗日歌曲辑录..... 王永秀 辑录
- 梅娘曲(39) 松花江上(171) 大刀进行曲(188)
- 歌八百壮士(199)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

张劲夫

一、上海—武汉—六安

约在193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当时处于抗战前线嘉定县的某地，乘军用运输车于夜晚回到上海租界，见到了王洞若同志。那时我带领一个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广东军队的六十六军地区，从事战地服务工作，我担任团长，张敬仁同志担任中共支部书记，党组织的关系归国难教育社党团领导。上海“八·一三”抗战后，郭老（郭沫若）有一次带领文化界人士前去劳军。之后，担负浦东防务的国民党军事指挥张发奎表示欢迎文化界人士到部队帮助做政治工作，想恢复北伐战争时期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传统。中共地下党经过研究，支持这一做法。据我的记忆，采取的方式是以抗日救亡团体名义，组织战地服务团去进行工作。因国民党军队都设有政训处一类机构，是受军统控制。战地服务团保持独立性，协助军队从事战地服务工作，不归政训处管，保证做到在地下党领导下，视情况发展，可进可退。最初成立的文化界战地服务团，张发奎请郭老挂名，想捞政治资本，郭老未挂名，由钱亦石同志出面担任团长。由于受到张发奎的影响，当时在上海参加抗战的广东籍的军人，许多部队都邀请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去战地工作。具体负责和各抗日团体接谈商办此事的，是张发奎部设在法租界的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杨德昭。杨原来是陈济棠驻在上海的代表，陈济棠下台后，这时成了张发奎的代表。此人颇有活动能力，认识上海各有关抗日救亡团体的人较多。记得当时广东

籍的军人罗卓英部请了妇女救国会组成了妇女战地服务团，由著名女作家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作者）担任团长。叶肇部则邀请国难教育社组成战地服务团，由我担任团长。还有吴奇伟部也邀请国难教育社组织战地服务团，记得去了刘季温等几个同志。还有哪些战地服务团则记不清了。由日本回国的一些留学生，由柳乃夫负责组成了一个内地救亡宣传团，好象未到上海战地前方去，到内地去了。总之，当时组织爱国知识青年成立战地服务团、抗日救亡宣传团，曾风行一时，我负责的战地服务团，就叫六十六军战地服务团。叶肇是军长，直接和他发生关系，具体负责和我们经常联系的，是叶肇指定的他的一位亲信参谋处长，此人掌握实权。参谋长姓华，是十九路军的，未掌握实权，和其政训处根本不发生关系，互相都存有戒心。战地服务团这时能做的工作，是对其军队所在地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支援军队作战。有些弹药、服装、伤兵等运输工作，动员附近群众帮助其兵站及时运输，也就是主要是帮助军队搞后勤工作，在这点上，部队比较欢迎。我们提出到其战斗部队去做点宣传工作，则遭到婉言谢绝。理由是前方不安全，他们要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因此不便到前方去。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设想的帮助国民党军队恢复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传统，实际证明是做不到的，是一种空想。国民党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广东军、杂牌军，尽管表面上有时也说点漂亮话，但都要牢牢掌握住兵权不受影响，则是共同的。即使在抗战开始时，部队在前方浴血抗战，实力派对掌握兵权的警惕性也是很高的。至于不妨碍其掌握兵权的地位，服务团帮他搞些后勤工作，受到欢迎这是很自然的。

我见到洞若后，洞若告诉我，中共江苏省委已成立，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是新从延安来上海的张爱萍同志。我们的组织关系，今后不归国难教育社党团，转归中共江苏省委，直接由张爱萍同志领导。洞若要我即去和爱萍同志接头，接头地点是卡德路卡德旅

馆二楼某号。我很快找到了爱萍同志,其屋子里有三个人同住,除爱萍外,一位是余立金,一位是吴克华,都是从延安新来上海的老红军干部,都担任过红军师长以上职务。我高兴极了,见到的不仅是红军,而且是老红军干部,可以跟他们学干军事工作了。爱萍同志和在座同志一起研究决定,以中共六十六军战地服务团支部为基础,成立战地特别支部,派余立金同志随我去工作,支部书记仍是张敬仁,余立金和我都是支委。原来的支委林一心同志已回租界里有别的任务,就不去了,张健同志原来是支委,仍保留,支委还有谁已记不清了。这个战地特别支部,直接归爱萍同志领导(后来知道他是省委军委负责人)。特支负责统一领导当时在战地广东军队各部队的战地服务团地下党工作。吴克华同志派去常州另有任务。因当时战事发展变化情况难掌握,万一与爱萍同志联系不上,我们可以到南京梅园新村找八路军办事处。这次接头,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这样决定了,余立金同志即和我一起出发了。当时处于抗战爆发初期,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口号提得很响亮(当时地下党在上海用这样口号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是在租界内,党的地下活动和抗战未爆发前相比已大不相同了,在卡德旅馆二楼一间屋子内我们四人研究这样的问题,毫无不安全之感,不似以前做秘密工作时戒备得很严很紧,时时防备国民党密探、军警的破坏。立金由延安初到上海,组织上给了一些制装费。他除制衣服处,还买了一个手提皮箱,一床羊毛毯,全部家当都装在箱子里了。我俩仍然乘坐军用运输车,在夜晚由法租界经南市绕路回到了战地服务团驻地。当时驻地处于沪宁路路南,离安亭不远,前线是在嘉定、宝山一带,隐隐约约可以听到炮声,机枪声听不到,可见离真正的接火线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共战地特支正式成立了,与罗卓英部的妇女战地服务团地下党关系接上了,吴奇伟部的地下党关系也接上了。各服务团情况都差不多,要找机会直接向部队士兵做工作很困难,大致都在驻地附近做一

些宣传工作、防奸工作(当时汉奸活动很猖獗),还有就是动员民工帮助军队搞军用物资运输,有河流的地方,还动员船工运输。和其部队搞兵站工作的基层军官倒有接触机会,不过这些人往往搞些贪污物资的名堂,吃、喝、嫖、赌,只要有机会就干,许多都是和主管长官有关系的私人,品质好的不多。加上时间不长,一直未能找到党的发展对象,只是一般地对其讲些坚决抗战到底的道理,他们表面上还是能接受的。

当时的群众情绪,一方面拥护抗日的热情高,一方面又感到彷徨,万一军队抗不住,向后撤退,老百姓怎么办呢?这一带小集镇的茶馆多,赶集的、喝茶的人非常关心战局,但无人给他们指出答案。我们当时接受的任务,只明确帮助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至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怎么办?是否留下来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因此我们未能回答群众这一问题,更缺乏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准备。

到了11月上旬,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很快占领松江县城,浦东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西撤。这时已无法回租界与爱萍联系,也无法通知由特支领导的其他战地服务团的地下党组织,我们特支所在的六十六军战地服务团,也就跟随六十六军部队向西撤了。第一步撤到昆山,接着经过苏州西撤到无锡,住了几天,战地服务团住在青阳镇附近的农村。这一带已筑有国防工事,国民政府要坚持在这一带抵抗,也看到一些军队在挖工事。六十六军有一个师已撤退到金坛,我们服务团有一部份同志也撤到那里。在这一段西撤过程中,有时下小雨,道路泥泞,鞋子陷在泥地,走不快,许多人干脆脱下鞋子,赤脚在走。记得那位参谋长有一次也只好脱下鞋子,赤着脚走。也许是广东人有赤脚走路的习惯,走起来像是很不费劲的。沿途所见景象,使我终生难忘。沿铁路两边村庄,居民都已跑走,见不到人,民宅被国民党撤退官兵洗劫一空。有时在铁路边,看到国民党士兵枪杀老百姓的场面,老百姓尽管跪在地下

苦苦哀求,但枪声一响还是倒下了。据说枪杀的是汉奸,过路的部队谁也不去过问。究竟是不是汉奸,还是勒索未遂而枪杀,也搞不清楚。驻在我们附近的有些国民党部队,成了散兵游勇,任意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用手榴弹炸鱼吃,军纪之坏,令人发指。如鲁迅深刻解剖过的某些人,对狼是羊像,对羊是狼像。目睹这一切,使我为实现抗战而兴奋的心,不由地紧缩起来,陷于痛苦的深思。这样的恶行,够不上做人的资格,更够不上做一个军人的资格。一个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景,能不痛苦深思吗?我们驻地的那一个村庄,离铁路线尚有几十里,居民未跑完,但人心惶惶,六神无主。我驻的那家农民,女儿在无锡缫丝厂当女工,尤其惶恐不安,很想在我们团里找一个对象,跟着我们一起走。这一家和我们感情亲如家人,这是在国难临头小民无主的情况下结成的深情。一家老少男女,生怕我们离开。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忍离去,但当时由于没有留下坚持打游击战争的思想,没过几天,又西撤了。在撤退这一天,我骑自行车去金坛看望那里的同志。等我夜晚回到驻地时,同志们已整装待发,我没有休息,就和大家一同连夜向常州方向走去。这时,我的心如铅块沉重,加上因来回金坛一二百里骑车累得够呛,我俯身倚着自行车,随队缓行,一言不发。如此心情,无形中对体力也有影响,走了一程,两腿酸痛,移步艰难,走一阵,坐下休息一会,实在不想走了。我们的团体是战斗的团结的相爱的集体,必须集体行动。同志们用一切方法减轻我的体力负担,走一阵,歇一会,终于在黎明到达常州。一到常州,特支就开会研究,像这样跟着六十六军西撤,不是办法,我们要考虑自己的行动方针,但我们的方针究竟是什么?讨论没有结果,决定派人前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请示。派谁去呢?决定敬仁、立金和我三人一同去。因事关重大,团体暂时只好随六十六军行动,等待新的指示,团体由留下的其他支委负责。

我们三人沿着铁路步行几天到达了南京。立金身体较胖,带

衣物行动较累。只得割爱把箱子托交别人，只随身带一床毯子，因他有长期军事生活经验。一到南京找到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可人已全部撤走，门上留一纸条：有事联系，可到武汉去找。这可把我们急坏了，怎么办呢？立即回去找团体，也不知撤到何处，而且找到了也因未得组织上指示，行动方针也定不下来。当即商定，我们乘火车去武汉联系，非找到办事处请示不行。这时，正值12月初，国民党政府机关都已撤走，到处纷纷然，惶惶然。到了下关火车站，火车已不正常运行，没有班次火车，因此根本就不卖火车票了。我们正在月台上商谈时，忽然发现停有一列货车。在一节敞蓬车内，搭一小布蓬，从中出来两位青年，见了我们，马上和我们攀谈起来。当得知我们是国难教育社的战地服务团人员时，表现很热情，说这列车装的是吴淞车辆厂的机器，奉命向后方撤退，他俩是护送机器的工人。并说吴淞工人夜校有国难教育社的人当教员，你们是救国组织，如果不见外，欢迎我们乘这列车去武汉。我们当然同意，并表示感谢。这样我们三人就乘了这列货车向武汉进发了。当时所有车站都在军事管制下，因装的是机器，不亚于军事物资的重要，由军事机关给行车文件，因此，除遇到空袭要暂停外，一般是每到一站，一验文件就予放行。记得有一次遇到空袭是在宿县符离集附近，列车停下了。我们下来散到附近隐蔽，向居民买了著名的符离集烧鸡，每只只需两毛小洋，真可谓价廉物美。每次空袭警报，列车都未受到轰炸，可见当时日寇的空军力量还是有限的。到武汉大智门车站的那天，恰是12月9日。一出车站，就遇见一队游行队伍，每人手持小旗，边游行边喊口号，是在纪念“一二·九”两周年。可见临时的首都武汉，抗战气氛确是很浓的。我们首先到汉口二马路抗战教育社（原国难教育社）歇脚，见到了刘季平、戴伯韬同志，打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点，便连夜去看望董老（必武）。董老住在一条道路很窄的弄堂内，办事处正在搬家，要搬到原来的日租界大石洋行内，董老还住在老地方未

搬。见到董老已是深夜，董老已累得眼皮睁不开。他一面恳谈，一面不时合眼，但话语极为热情关切。他告诉我们：八路军办事处对外是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是博古同志，组织部秘书是黄文杰同志。要我们找黄文杰同志接头具体谈工作问题，新接头地点是大石洋行。第二天我们就找黄文杰同志，黄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不日即有重要精神传达，要我们等候指示。立金是老红军，没有社会关系，只好住到办事处里，敬仁和我二人，因和抗战教育社有关系，就暂住那里。工作上直接和黄文杰同志联系。

抗战教育社社址也是《抗战教育》刊物的编辑部地址，是由原来在上海出版的《生活教育》刊物改名的。《生活教育》原来是伯韬负责编辑的，这时加上季平，可能还有陆维特同志。只有一两间房子，大家都睡地铺。虽然从上海分别不久，但因在战火中相遇，倍加亲热。上海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的同志，许多都是在山海工学团工作的，这时陆续从各地撤退到武汉，人越来越多，原地方住不下，很快就在武昌一条小街上找到了几间大房子，来的人都挤着住下了。当时集中到武汉的，记得有陈光宇、黎明两位女同志，有操震球、查淑怡夫妇二人，还有宋承勋等。敬仁和我在《抗战教育》刊物上登一小启事，望六十六军战地服务团的同志，见到启事后来武汉联系。没几天，张健同志和陈佩明同志及我的爱人胡晓风同志，由我的二叔护送，从合肥故乡也来到武汉，四弟张琢这次也由他们带到武汉。这个松散的团体，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也有少数是党的外围群众。在上海期间，大家都是拿的生活费，没有拿工资的。有稿费收入的同志，有时还拿点钱帮助别的同志。大家都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陶行知的作风熏染，生活一般都过得俭朴节约，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无形中是过着一种朴素的公社式的生活。这在旧社会那样的环境，在这样的松散团体内人们的相处融洽，亲密无间，是不多见的，也是值得大家怀念的。

不久，洞若随同爱萍由上海经苏北一路也撤退到武汉。爱萍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洞若住在《抗战教育》社。约在12月中旬的某一天，爱萍通知洞若、敬仁和我，还有立金，到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向我们传达中央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记不清洞若在一个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爱萍说他回答不了这一问题，要请博古同志另约时间和洞若面谈。在传达后，爱萍说大家都听候长江局组织部分配工作，以往在上海他负责我们的组织关系，至此结束，他不再负责联系，由长江局组织部负责联系，分配各人的工作。接着长江局组织部把我们的组织关系都转到湖北省委了。分配敬仁、张健等同志从事工人工作，晓风在长江局办的训练班学习后，也分配做纺织工人工作，因她本人也是纺织工人出身。我的工作，是和当时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同志直接接头的。郭述申当时穿了一身大棉袍，和我在一处约好的秘密接头地点见面。他谈话很亲切，要我去联系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正在和国民党汤恩伯部接头，可能要去汤恩伯部做抗日宣传、战地服务工作。因我在上海战地搞过这样工作，省委要我到这个团体负责党的工作。并说明长江局指示精神，是要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里去，帮助他们恢复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才能坚持抗战到底。因汤恩伯部又系蒋的嫡系。我当时还觉悟不到王明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期把抗战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的右倾错误，只是朴素地感到，要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政治工作很困难，倒是前方战地群众彷徨，处境凄惨，很需要人去做工作。因此提出要求，请求组织不要派我到这个团体去，而派我到前方战地去做地方群众工作。同时汇报了从上海撤退的沿途感受，觉得目前集中在武汉的干部多，真正处于前线地区急需人去，而去的人又很少，恳切请求组织派我去前方。郭述申同志态度很好，说我的意见一定向长江局转达，目前先接受这一任务，马上去接头，再听候长江局安排。这样我就按照郭述申安排的接头方法，和这个

团体的党员负责人接上了头。他是团长，姓赵，名字已记不清了，好像叫儒洵。他表示高兴得很，说这个团体是由平津学生向南流亡沿途集合起来的，大多是大学生，也有少数中学生，还吸收了一部分铁路青年职工。互相并不很熟悉，大家都有一股爱国热忱，抗战积极性很高，但对如何抗战，如何参加抗战工作，想法很不一致，各有各的想法。至于前去汤恩伯部工作，有赞成去的，也有不赞成去的，赵团长正处于为难状况，我去负责，他感到信心增大了。我俩商定，先了解情况，做点互相熟悉团结的工作再说。约定第二天要我和全体人员见面，见面总要用一个名义，暂用副团长的名义吧，算是从武汉约集来的。因这是群众自愿结合的团体，不是官办的，不能委派，可以推选，也可以约请，主要是为大家尽义务，办点事。在见面时，每人逐一作自我介绍，我记得有朱穆之同志，陈纯英同志，其他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其中有一位铁路青年职工（他们都穿得整齐的铁路制服，很精神）自我介绍后，结束语加上一句“未婚”，引起哄堂大笑，气氛是活泼热烈的。互相虽然不甚熟悉，但都为着一个共同的抗日目标集合到一起了，一般还是相处得来的。当时地下党员只有很少几个人，但有不少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穆之当时就是民先队员。因此就总体看，这还是一个进步的抗日救国团体。在初步接触中，气氛还是融洽的。

撤退到武汉的救国会会员及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的一次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及边章五同志出席参加了。会上大家纷纷提出问题请周恩来同志解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区能否开展游击战。恩来同志明确回答：既有其困难一面，也有其有利条件。我们大部队去活动有困难，敌人派大部队去“清剿”也困难，因此只要真能依靠群众，执行正确的政治、军事政策，是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他所回答的问题正是我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在会上没有发言，因到会的老先生很多，但我内心是很赞成恩来同志的观点的。虽然我

缺乏军事经验,甚至连军事知识也很缺乏,但我朴素地感到,群众抗日情绪是高的,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只要有党的领导,派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去组织群众打游击战争,是会受到群众欢迎的。我深感后悔,在当时撤退时缺乏这样明确的认识。后来在1944年华中党校整风时,我回顾总结这一段经历,认为如果我们当时真正领会了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思想,明确恩来同志所谈的观点,留在长江三角洲、苏南地区,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几千人队伍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吸收不少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下级军官参加进来。当时国民党部队军纪那么坏,责任不在士兵和下级军官,如果按照我们党坚持抗战,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去争取他们,会有许多人愿意参加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早在1937年底或1938年,在苏南地区组成我党领导的几千人游击队,迎接新四军主力东进,建立苏南抗日游击区或小块根据地。这不是空想,而是完全可能的。后来新四军东进苏南和长江三角洲,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力量较小,胡传魁式的土匪部队、国民党特务部队及地主武装部队较多,遇到的困难较大。刘少奇同志1939年底到达皖东后和我们谈话中讲到,要学会掌握历史先机,这是一天等于20年的时机,要善于认识到掌握住,否则时机失去,要受到历史惩罚。联系到这一段经历,感到讲得极为深刻。这些都是后来的体会,在武汉时还认识不到这样的程度。

经过我的几次要求,郭述申同志向长江局反映后,大约在春节前明确答复我,组织上同意我的要求,派回安徽前线去开辟工作,组织关系由湖北省委转回到长江局组织部。我立即去长江局组织部转关系,这次和我接头的不是黄文杰同志,而是刘顺元同志。他当时是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穿一身半旧大棉袍,谈话明快热情,给我印象很深。他发给我一张登记表,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填的表,在上海地下党时期是无法也不准许填表的。我当场把表格填好后交给他,他告诉我过几天来谈话,我兴

奋极了。回来就买了一本地图,反复查看安徽的地理图形,江河山川,各县城镇所在地,拿着报纸,按战讯寻找战事发生在安徽的位置地区,琢磨第一步回到安徽何处。我虽在安徽出生,10岁就随父母外出谋生,父母当佃农,好不容易给我读了几年书,以后到南京、上海,终于找到了党。我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穷孩子,在安徽没有什么上层关系,有的是一些穷亲戚。当时组织上鼓励党员通过社会关系去开辟工作,先要有一个立足点。正在我日夜苦思时,有一天季平、伯韬告诉我,冯玉祥先生想约陶行知先生的几位学生去他家吃便饭,其中除他二人外,还有我及操震球、宋承勋、唐文萃。洞若、维特是否去了,记不清。这是在春节前一天吧,按旧习是吃年夜饭。冯先生在武汉的临时居处不算宽敞,也只有几间房子。穿的是刚过膝头的袍子,可算是“冯式”袍子,未见别人穿过。长眉毛,满脸红光。接待很热情,谈话声音宏亮,巢县乡音乡语未有大改,如讲“找工作”,仍说土语“出外谋事”。菜肴简单,主菜是一个大沙锅炖猪肘子,有好几斤,加上一、二十个茶叶蛋放进去,平常叫作元宝蛋,是普通的家常菜,还有几样小菜。大家吃得很香很饱,很为别致。边吃边谈,冯先生得知震球、承勋和我三人是安徽人,就问愿不愿回乡参加抗战工作。震球立即表示很愿意,承勋和我也是同样的。冯先生主动说,现在安徽是广西军李宗仁主政,兼省政府主席,他和李熟识,可以写信介绍,立刻嘱咐秘书起草信件。信起好后,亲笔签名,极为爽快,表现军人作风。

一过春节,我去长江局组织部刘顺元同志处谈话,汇报了经过冯玉祥写信给李宗仁的情况,估计回去找一立足点是容易做到的。计划第一步去六安,到六安后的情况再向长江局汇报。顺元同志告诉我:此去任务是开辟安徽工作,安徽党组织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有一些零星组织关系和党员关系,尚无正式党组织(后来知道,已有一些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同志和经延安学习回去的同志,分别在寿县成立了安徽工委、在无为成立皖中工委),长江局正在